



人文译丛 总主编◆何怀宏

Acts of Meaning

有意义的行为

[美]杰罗姆·布鲁纳◆著

魏志敏◆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人文译丛 总主编◆何怀宏

Acts of Meaning

有意义的行为

[美] 杰罗姆·布鲁纳 ◆ 著

魏志敏 ◆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意义的行为 / (美)布鲁纳著;魏志敏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11

(人文译丛)

ISBN 978-7-206-07191-1

I. ①有…

II. ①布… ②魏…

III. ①意义理论—研究

IV. ①B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6817 号

有意义的行为

著 者:(美)罗杰姆·布鲁纳

译 者:魏志敏

责任编辑:郭 威 谷艳秋

封面设计:张 迅 孙浩瀚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制 版:吉林人民出版社图文设计印务中心

印 刷:长春方圆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1000mm 1/16

印 张:9.75 字数:13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7191-1

版 次:2011 年 1 月第 2 版 印 次: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 序

中国乃一文明古国，而人文精神又于其间特见其长。“周文”已灿然可观，而孔孟老庄荀韩等先秦诸子更大略厘定此后二千年中华文化发展基本格局，且时有奇葩竞放，异彩纷呈。然近代以来遇强劲欧风美雨，不免花果凋零。究其因，既有外来文明之横决，亦有自身后继之乏力。

今日世界一体，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发展乃至生存，古老的华夏文化更有从域外接引各种源头活水之亟须。百年来国人译事多多，今不揣浅陋，亦立此一“人文译丛”，名称不惮其大，俾使各种有价值译著多能收入其中，且有愿为中华人文复兴略尽绵薄之意焉。

译丛取材选目则不吝其小，且力求主题相对集中，现约略勒成数专辑：一曰西方古典思想与人物，尤以古希腊为要。二曰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特重近代以来作为西方思想制度主流之自由民主的发展。三曰知识分子与自由市场，全球化使我们皆卷入市场经济，而人文知识分子对此的态度尤可玩味。四曰基督精神与人文，此种超越性大概正是较现实的中华人文所需特别留意处。五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思想，藉此希望国人眼光也能注意我们近邻心灵的深邃。六曰《学术思想评论》，由贺君照田主编，其中有译有评，最近几辑尤注意中西历史交叉延入“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

数年来能有此初步实绩，端赖吉林出版界领导周君殿富、

胡君维革大力支持及责编与诸多译校者鼎力相助。“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文复兴并非“指日可待”之事，我们愿使“人文译丛”成一长久事业，除继续充实现有专辑外，亦将开辟新专辑，并深祈此一事业继续得到各界同人的关注与支持。

何怀宏

2002年11月18日

谨识于北京西郊泓园

重版总序

凡是在出版业工作的人都知道一句行话，叫做“选题定位”，或曰“图书定位”，亦曰“市场定位”。我非常赞成这句话。一个出版社必须进行明确的选题定位，只有明确的选题定位，才能打造图书品牌乃至出版社品牌，只有有了品牌才能占领市场，出版社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近些年来，我社的选题定位是十分明确的，就是主打国内外学术类图书。就国内的学术著作而言，我社先后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60 年实录》（10 卷）、《北大哲学门》（10 卷）、《高清海哲学文存》（6 卷）、《孙正聿哲学文集》（9 卷）、《楚辞源流选集》（5 卷）、《中日甲午战争全史》（6 卷）、《毛泽东评点的帝王大传》（16 本）、《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学术文库》（6 卷）等高档次、高品位的学术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就国外的学术著作而言，我社先后引进出版了《人文译丛》（60 本）、《绿色经典文库》（16 本）、《大美译丛》（8 本）、《支点丛书》（10 本）、《世界经济畅销书系》（10 本）、《人类文明史图鉴》（24 本）、《西方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读本》（22 本）、《美国思想史》、《西方建筑史》、《剑桥战争史》、《剑桥医学史》等在世界上较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好评。从总体上说，图书的价值主要在“传承”和“传播”4 个字上。“传承”是就历史纵向而言，图书要为后人传承人类创获的思想文化成果；“传播”是就历史横向而言，图书要向世人传播人类创获的思想文化知识。我社出版的学术类图书，虽然远远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但我们一直向着这个方向努力。

在我社引进出版的外国学术类图书中，最有影响的是何怀宏先生担

任总主编的《人文译丛》这套丛书。何先生是一位学术精深、工作认真、待人诚恳、诲人不倦的专家学者。为编好这套丛书，他亲自确定书目、遴选译者、审阅书稿，每一本书都饱含了他的心血。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10年的努力，到现在这套丛书一共出版了60本。一个地方人民出版社能够出版一套60本的外国学术著作丛书，实属不易。每当看到这套丛书时，我们总是对这套丛书的总主编何先生产生由衷的敬意。

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文译丛》这套品牌性图书，最近，我社调集30多名资深编辑，对这套丛书进行了重新出版。在重版过程中，我们主要做了以下三项工作。第一，将已经出版的《人文译丛》中的图书悉数收入，同时又从我社出版的外国学术著作中选出20本，加在《人文译丛》中，使《人文译丛》总量达到80本。第二，将收入《人文译丛》的80本图书，统一开本，统一纸张，统一版式，统一封面风格。第三，对80本图书进行重新编辑校对，对个别图书的有些文字或段落进行了处理。通过以上工作，使这套丛书更加完善了。

有人说：翻译出版一本外国学术著作，比自己撰写出版一本学术著作还要难。这话很有道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重版的《人文译丛》尚存在着以下三点不足。第一，有个别图书，从学科属性上讲，放在《人文译丛》中不甚合适，敬请广大读者原谅。第二，有些图书中的个别译文还不够准确，编校也不够到位，敬请广大读者指正。第三，有些图书中的思想观点，囿于历史局限，我们不能接受，敬请广大读者进行批判性的阅读。

重版《人文译丛》，对我社来说，既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在三个多月的工作中，全体编辑、校对、照排和印制人员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令我感动不已。在此书即将付梓之际，我真有许多感谢的话要说，纸短情长，不尽一一。

胡维革

2010年9月28日

于长春百汇街寓所

前 言

书籍就像突出海平面的山峰，尽管它们看起来像是孤零零的岛屿，但它们意味着一块新大陆就要出现在面前。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某个带有普遍意义的课题的一部分。而它们不可避免地要反映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它们是一片广袤的知识大陆的一部分。本书也不例外。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心理学——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曾称之为关于心智的科学——正处于其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分裂时期。它丧失了自己的核心，并且面临失去维系其内在交流所必需的凝聚力的危险，而只有这样的交流才能确保心理学各部分之间合理分工。心理学的各部分都有自己的组织实体、理论架构，通常还有自己的期刊，它们分属不同的领域，各自成果的可交流性愈来愈差。它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将自己封闭在自身的学术体系中和学术权威的领地之内，这种自我封闭使各部分（心理学越来越像是一个由零散的各个部分拼凑在一起的整体）与其他领域的探索距离越来越远，而这些探索旨在把握人的心智和人类的处境——对人性的探索或对其他社会科学的探索。

过去的一切可能已经有了很好的答案，或许还折射出一次“角度转换”，这在人文科学领域中是必要的。“生物学”层面的心理学摒弃了自己的古老基础而加入了神经科学，新兴的“认知科学”则吸收了过去属于感知、记忆、思维等领域的很多东西，而现在这些领域被认为是“信息处理”的分支。这些新组合的积极意义在于：它们可能给旨在剖析人类的研究工作带来新的、出人意料的理论力量。

尽管分裂和条块分割似乎在所难免，但我认为心理学不会因此走向毁灭，也不会注定永远分裂下去。心理学当初是一个整体，虽然后来“共同”探讨的问题分裂为一系列彼此独立的部分，但其主要问题仍然具有活力。冯特（Wundt）于1879年在莱比锡创立的心理实验室并没有取消这些问题，只是给它们披上了一件新外衣，这种“新式”的实证主义风格颇受19世纪晚期心理学前辈的青睐。即使是冯特，在其晚年也意识到新的“实验”风格可能会退去，进而形成一种“文化心理学”，并主张我们借助一个更具历史意义、更能说明问题的方式来理解人类的文化成果。

我们至今仍然从很久以前的前实证主义者那里汲取丰富的营养：乔姆斯基（Chomsky）毫不掩饰他对笛卡尔（Descartes）的崇拜，皮亚杰（Piaget）离开康德（Kant）就寸步难行，维果茨基（Vygotsky）则不能没有黑格尔（Hegel）和马克思（Marx）的指导。高耸的“学习理论”之峰也是建立在约翰·洛克（John Locke）铺就的理论基础之上。弗洛伊德（Freud）的后继者们虽然摆脱了“生物能学”模型的羁绊，也只是突破了其理论最浅显的部分，心理分析可能继续在原有的理论上成长，新近的认知革命如果没有当时哲学环境的支撑是难以想象的。实际上，即使有人突破了“正统”心理学的界限，注意到人文科学的其他姊妹学科，也会对本世纪提出的经典问题再度产生浓厚的兴趣，这些问题由继19世纪的冯特在莱比锡创立心理试验室之后的尼采（Nietzsche）和皮尔茨（Peirce）、奥斯丁（Austin）和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雅格森（Jakobson）和德·索绪尔（de Saussure）、胡塞尔（Husserl）和卡西尔（Cassirer）、福柯（Foucault）和塞尔（Searle）等提出。

毫不奇怪，困扰心理学的狭隘和“封闭”正在受到抵制。广大知识界越来越多的人对我们的期刊不屑一顾，这些期刊似乎主要是面向外行人，并仅停留在对琐碎问题的研究上面，每期刊列举一些无足轻重的研究项目。心理学学者们对我们的学科现状以及对其新的重组方式的探索有一种担忧和不安。尽管人们对“短小精悍的研究项目”和曾经被戈登·

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称之为方法论的东西反响强烈，但是心理学的主要问题还是被再度提出——关于心智的本质和形成过程的问题，关于我们怎样构造意义和本体的方法问题，关于心智在历史和文化层面的构成的问题。

相对于内在的“正统”心理学，这些问题通常更侧重于探索外围世界，并且正在借助某种微妙的力量进行自我整合，而这种微妙的力量激发了许多内涵丰富的答案。现在，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大比较》（Great Comparisons）一书中的方案，这些方案一直在挑战心理学：人类与其进化祖先之间的比较；尚未成熟的孩子与完全成熟的成人之间的比较；完全健康的人与受精神疾病或孤僻症困扰的人之间的比较；不同文化中的“人性”之间的比较，实际上甚至还包括有血有肉的人与模仿人的机器之间的比较。随着关于心智、意识状态、意义、本体构造、精神原则、文化形式等禁忌话题的提出，人们开始热衷于对这些领域的探索。奥克姆（Occam）的“剃刀原则”告诫我们不要搬弄那些不“必要”的概念，头脑中一定不要抛开精神科学。约翰·斯图尔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提出的要消灭一切求知欲的演绎原则也没能拯救那些可能满足于可控实验的人们。

本书以当今的心理学为背景，并考虑到它混乱、脱节和新的简化现象，我将其称为《有意义的行为》是为了强调它的主题：即意义构成的本质和文化结构，及其在人类行动中所处的核心位置。我写的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通自传性质的遁词，尽管读者很快就会发现它“反映了”我长期作为一名心理学家的经历。所有的独立见解都是从对话中提炼出来的，就像巴赫金（Bakhtin）教导我们的那样。我长期参与旨在构造和改革心理学的对话，这是一大笔丰厚的财富。我在以下各章中的言论反映了我对当今这类对话的观点。

这不是说要对意义构造过程的方方面面进行“全方位”的研究，那样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更确切地说，心理学自身要专注于研究意义，并努力阐释此时心理学的状态，阐明它会怎样不可避免地变为文化心理学

的过程，并说明它会怎样必然地突破实证主义科学的传统目标，而以简化论、因果性解释和预测为理想。这三者不需要刻意地兼顾，因为当我们探索意义和文化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另外一个对象。要把意义和文化归结到物质基础，比如说它们“依靠”左半脑，就意味着不重视“错置具体性”的作用。坚持单纯地从“诱因”方面进行解释，就会妨碍我们把握人类对世界的理解以及我们对人类的理解行为的理解。如果我们将心理学的客体（有关任何理智的进取心）作为理解的成就，那么我们为什么总是要提前理解所观察到的现象——预测又意味着什么呢？似是而非的理解不是更倾向于因果性解释吗？特别是当因果性解释的成果迫使我们人为地以几乎超越认知的研究内容代替人类生活的时候更是如此。

对人类心灵的研究是如此艰难，研究在客体和替代物两者之间是如此地摇摆不定，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动用昔日物理学中的思维方式进行探索。具体而言，这件任务异常重要，需要我们将各种深入的见解用于分析理解人类对世界、对其他人及其自身的看法，这也是我们应该秉承的精神。

鸣谢

我不能一开始就罗列策划这本书的所有人和机构。从很多方面说，本书不仅代表着当前我本人的大部分想法，似乎还代表着某种“被压抑观点的回归”。因为，我受到的某些影响发生在遥远的过去，如在哈佛大学社会关系学系的那段时间，我从20世纪中期开始在那里呆了10年，在此期间我深受克莱德·克拉克弘（Clyde Kluckhohn）和戈顿·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特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亨利·默瑞（Henry Murray）的启发并受益匪浅。该系有一个目标，我们每月都要聚在一起开一次研讨会，阐述那个目标：即怎样协调两类观点之间的关系，一类是作为一个独特个体的人的各种观点，另一类是那些作为文化和生物有机体的表达的观点。那些在每个星期三晚上讨论的内容将在后面的文字中有所反映。

还有“社会科学八论”（Soc Sci8）及“人”的概念，在这些方面，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和我试图说服一代哈佛人和雷德克利夫（Radcliffe）式的大学生们：要想了解一个人，你必须把他放到动物王国（他从那里进化而来）的背景中去审视，而且要联系文化和语言，因为这两者构成了他赖以生存的符号世界，还要考虑到将这两股强大的力量糅合在一起的发展过程。但我们不久后确信，心理学光靠自己不能完成该任务。所以，我们建立起一门属于我们自己的跨学科人文科学——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该学科开设在20世纪60年代的大部分年份，具体讲授时间是从每年的9月到次年的5月，我们努力保持领先我们的

学生一步。

在这期间，认知研究中心成立了，我们将在本书的开篇第一章中更多地谈到它。我在这里提及它只是为了向另外一个团体致意，这个团体促使我确信划分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和哲学等领域的界限是为了方便行政管理而不是因为知识方面的原因。

另外，还有那些长期的交流伙伴：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大卫·克莱屈（David Krech）、亚历山大·鲁利亚 Alexander Romanovich Luria 等。

早期有几位朋友读了本书的手稿，并提出了有益的建议。他们是迈克尔·科尔（Michael Cole）、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罗伯特·立夫顿（Robert Lifton）、丹尼尔·罗宾逊（Daniel Robinson）和唐纳德·斯宾塞（Donald Spence）。我对他们的帮助表示由衷地感激。

我特别要感谢在耶路撒冷接待我的人们。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阿姆诺·帕兹（Amnon Pazi）校长、莱克特·约莱姆·本·普拉茨（Rector Yoram Ben—Porath）、史密尔·艾森施塔特（Shmuel Eisenstadt）教授和理艾德·梅伯格（Liat Mayberg）女士。我在耶路撒冷的讲座内容构成了这本书的初稿，我很少面对那么投入、那么精明的听众，他们在12月的午后聚集在斯克帕斯山上听我演讲，他们的评议和提问促使我对讲稿作了卓有成效的修改。我也很感激斯宾塞基金（Spencer Foundation）给予我的资金支持，这是我完成本书的基础。

最后，我要表达对出版人亚瑟·罗森塔尔（Arthur Rosenthal）的感激之情。我还要感谢该出版社的其他人：安吉拉·冯德利（Angela von der Lippe）总是巧妙地鼓励我；卡利·史密斯（Calille Smith）是一位极具耐心和想象力的书稿编辑。

仅将此书献给卡罗尔·费舍尔·弗里德曼（Carol Fleisher Feldman）、我的妻子和同事。它将在人们不知不觉的时候悄然面世。

目 录

前 言	001
鸣 谢	001
第一章 人文研究	001
第二章 作为文化工具的通俗心理学	031
第三章 意义剖析	065
第四章 自传和自我	097

第一章 人文研究

—

我想从认知革命说起，这场革命在经历了客观主义的寒冬之后，试图将“心灵”带回人类科学领域。但是，我的学说不是简单地描述这一勇往直前的历程。^[1]因为至少在我们看来，这场革命现在已转变为几个问题，而这些问题与当初催生它们的推动力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实际上，认知科学已经被技术化了，甚至于被削弱了当初的推动力。这并不是说它失败了：恰恰相反，因为认知科学注定是学术交易所中成长最快的股票之一，它可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而这种胜利是在付出高昂的技术成本后获得的。有些批评人士——甚至是毫不客气地——指出，新的认知科学作为这场革命的产物，已经取得了技术上的胜利，付出的代价是让心灵这个概念失去人性化。而它一直追求的就是重新确立心灵在心理学中的地位，因此，它使心理学中的许多内容与其他人类科学和人文科学分离开来。^[2]

我将进一步简短地阐述这些问题。但在此之前，我要为您列出本章以及后面几章的计划。当我们回顾完那场认知革命后，接着会对即将再度兴起的革命进行初步的探索。这场革命更倾向于解释与“意义构成”相关的认知，它在过去几年时间里，已扩展进入人类学、语言学、哲学、文学理论、心理学的领域中，时下，差不多在所有领域都能看到它的影子。^[3]我甚至怀疑如此强劲的发展可能会重拾当初第一次认知革命的势

头。我将在后面几章里对某些研究进行初步但具体的阐述，这些研究以心理学与人文科学领域、社会科学领域中邻近学科之间的界限为目标，而且具有当初认知革命的那股发展势头。

现在，先让我来阐述我和我的朋友们对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发生的那场革命的想法吧。我们认为，它试图竭尽全力将意义确定为心理学的核心概念——不是刺激和反应，不是明显可能观察到的行为，也不是动物本能及其转变，而是意义。它不是一场反对行为主义的革命，其目标也不是通过往行为主义中加入一点心灵主义使之成为更好的心理学研究方法。爱德华·托尔曼（Edward Tolman）曾经那样做过，但收效甚微。^{〔4〕}那场革命要比这深刻得多，它的目标是发现并正式地描述人类与周围世界交流时所产生的意义，进而提出与意义生成过程相关的假设。它关注人类在描述和理解整个世界和他们自身时所进行的符号行为，其目标在于加速推动心理学与其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内的辅助性姊妹学科携手发展。实际上，表面上认知科学日益计算机化，但以上所说才是真正的事实——起初是缓慢推进，现在其动能不断增强。所以，如今人们发现文化心理学、认知和解释人类学、认知语言学等研究中心一派繁荣。总之，自从康德关于心灵和语言的哲学出现之后，这一领域就一直保持着旺盛的进取性。它很可能成为时代性标志，代表人物是 1989-1990 年在耶路撒冷—哈佛联合讲座的主讲者们，他们有着各自的方式和传统——格尔茨（Geertz）教授在人类学领域独树一帜，而我在心理学领域也有着自己的独立见解。

正如人们最初想象的那样，认知革命从本质上要求心理学与人类学和语言学、哲学和历史，甚至于法律学形成合力。所以，在哈佛大学认知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gnitive Studies at Harvard）成立的初期，组成人员中有一位哲学家奎恩（W.V. Quine），一位睿智的历史学家斯图尔特·休斯（H. Stuart Hughes）和一位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这毫不奇怪，也绝非偶然。或者说，中心内的哲学家、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其中还有诸如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等新构造

主义的倡导者——在数量上与心理学家不相伯仲。至于法律学方面的代表，我必须说明，该中心的几位著名法律学专家只是偶尔参加我们的座谈会。他们当中的鲍尔·弗莱德（Paul Freund）承认是因为我的缘故才来到中心，他所感兴趣的是，规则（比如语法规则，但不包括科学公式）如何影响人类的行动，以及法学究竟需要研究什么。^[5]

我想现在应该向您说明，我们不是要站出来“改造”行为主义，而是要替换它。正如我的同事在随后几年里说的那样，“我们将我们的新信条钉在门上，而后就等待着，看会发生什么情况。一切都很顺利，事实上是非常地顺利，以至于最终我们可能是白白地为我们能否取得成功担心了那么久”。^[6]

如果写一篇关于上个世纪后四分之一时期的学术史的论文，追述认知革命的原动力以及它分裂、技术化的过程，肯定会引人入胜。完整的故事最好交给那些睿智的历史学家去写。现在，我们需要弄清的是沿途的标志牌，它们已足以为我们指明即将前往的知识领域内的情况了。比如，很早之前，研究重心就从“意义”转向“信息”，从意义的构成转向信息的处理，这些都是影响深刻的变化。这一转折中的关键要素是计算作为主要的隐喻方法而被引入，以及可量化计算成为好的理论模型的基本标准。信息与意义的关系不大，从计算的角度来说，信息由系统中未进行编码的信息要点组成，而意义要经过归纳才能成为信息要点，它既不是计算的结果，跟随机分配式的计算存储也没有关系。

信息处理是指根据中央控制单元的指令，在存储地址上记录或获取信息要点，或将其暂时存在缓冲存储器上，然后按照指定的方式操作：列表、命令、组合、对比未编码的信息。完成所有这些工作的系统对其存储的是莎士比亚诗歌中的文字还是随机数据表中的数字均一无所知。根据典型的信息理论，如果一个信息要点减少了可能的选择性就具有情报价值。这就暗含着一个锁定某种选择的代码，可能性序列和它们包含的例证要按照系统中的“语法规则”——可能出现的变化情况——进行处理。到目前为止，这一分配系统中的信息仅能处理字典层面上的意义：